

创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
最受读者欢迎的人文思想读本

在北大听讲座



第15辑 文池/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在北大听讲座

张岱年题

文 池/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北大听讲座 (第十五辑) / 文池主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

ISBN 7-80228-012-5

I. 在… II. 文…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2843 号

在北大听讲座 (第十五辑)

策划: 孙 娟

主编: 文 池

责任编辑: 慧 钰 子 寒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e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 × 970 1/16 字数: 329 千字 印张: 16.5

印数: 1 ~ 8000 册

版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228-012-5/G · 007

定价: 29.00 元



我相信人必须摆脱奴役和使人麻木不仁的幻想。为了创造一个不需要任何幻想的世界，人必须意识到人本身内在的和外在于人本身的现实。只有丢掉幻想，人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

——弗洛姆

目 录

1	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格局和中国	何芳川
19	伊拉克目前局势与未来走向	王锁劳
31	中美日三边关系	王缉思
51	世界格局与中国安全	贾庆国
69	从民企国企差别到交换和价值	茅于軾
81	中国现代社会转型	周飞舟
95	市场化迷信与中国经济的两难处境	左大培
111	对新时期城市规划的思考	陈为邦
129	中国电视新闻竞争报告	谢耘耕
143	超越大众民主与权威主义 ——共和主义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启迪	李 强
163	译介学与比较文学理论建设	谢天振
185	有效沟通漫谈	金正昆
201	中庸之道与礼乐文明	张 辛
217	当代虚无主义省思	俞吾金
235	爱的哲学	吴 青
251	坚守传统的审美精神 ——当代中国古典舞的文化个性和文化品格	袁 禾

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格局和中国

何芳川



阅读提示: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种和平、和谐、科学、可持续的发展态势。从古代格局中的主动,到近代以威斯特发利亚(Westphalia)和约体系为基础的国际格局中的被动,到了现在,中国应该重新主动起来。当然这种主动,不应该是古代中华帝国那样的主动,更不是近代西方殖民列强那样的主动,也不是当今在国际上大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的主动,而是一种“以和为贵”、多元文明平等互利的主动。



何芳川

男,山东菏泽人,193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日本樱美林大学名誉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近代史、亚洲太平洋地区史。主要学术专著有:《世界历史:近代亚非拉部分》(与郑家馨合著,北大出版社1990)、《崛起的太平洋》(北大出版社1991)、《非洲通史(古代卷)》(第一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北大出版社1996)、《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与万明合著,商务印书馆1998)、《太平洋贸易网500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二届东亚四国大学校长论坛文集》(主编,北大出版社2001)、《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



各位同学：

大家好！（掌声）

非常高兴和各位见面，并汇报我这段时间以来的一些心得和体会。我离开学校行政以后，正好有更多时间用于读书和思考，今天的讲座可以算是我的一点思考成果吧，希望和大家多多交流。我讲的题目是“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格局和中国”。国际格局是会经常发生变化的，但这样的变化，既有大局的，也有中局的和小局的。作为东亚的一个大国，我们的国家将在二十一世纪什么样的国际大局、中局和小局中运行和发展，这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座各位，将是二十一世纪促进国家发展以及进行国际交流的主力军团，所以大家理当比我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我是学历史的，喜欢用历史的眼光探询现实。我们暂且先不讨论现在所处的二十一世纪，而把目光转到一百年前，也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1901年，李鸿章签订了《辛丑条约》，那时，他所面对的国际格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时候的年轻人、时代的主力军团，他们眼中的中华民族是在怎样的国际格局中运行着呢？如果我们倒退两百年，也就是1800年前后，那时，大清帝国乾隆皇帝去世不久，嘉庆皇帝已经继位，赐死了大贪官和珅，开始了自己掌权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中，中国的上层社会成员、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当时的世界呢？他们有没有世界格局这样一个理念呢？如果有，会是一个怎样的理念呢？如果没有，他们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周边世界、看待大清王朝的位置呢？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四百年，也就是1400年，当时的大明帝国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六百年前的此时，郑和正在永乐大帝的指示下，紧锣密鼓地安排他的货物、组织他的船队、组编他的船员，准备七月份的扬帆远航。那么，永乐大帝和郑和这批社会上层以及当时另外一些中华民族最先进的份子，他们的国际格局观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在他们的脑海中，大明帝国是在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架构中向前运作的呢？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延续而来的，中国人也是从我们的祖先开始祖祖辈辈延续到今天的，而今天的世界走向正是由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越来越快的运作、越来越密切的交流而推动的。所以，我的一个观点是，当我们作为当代中国人来关心国际格局的时候，当各位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前卫部队、主力军团在二十一世纪驰骋自己的青春、开创自己的人生时，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时一定不能离开过去，



李鸿章像

李鸿章,1823年出生于合肥。24岁中进士,后组建淮军,镇压农民起义。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所以又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力图富国强兵;对外曾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901年卒于北京。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作为中国特使,应邀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顺访欧美诸国。3月27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李鸿章携包括儿子李经方、李经述在内的随员45人,从上海登上法船“爱纳司脱西蒙号”,翌晨离沪,出东海,经太平洋、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又由迎候的俄国马赫托姆斯基公爵接上“俄罗斯”号,于4月27日抵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敖德萨,改乘火车北上。李鸿章此番“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余里之海路”使俄,其主观愿望是联俄并促使俄、德、法三国挟迫日本放弃对我辽东半岛的占领。他在俄国拜会了新沙皇并草签了《中俄密约》,然后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巡访并向部分国家的元首递呈国书。在由太平洋取道横滨回国时,感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疯狂的割地赔款要求,他曾拒不上岸,以抒怨忿之气。

李鸿章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不能离开历史。当然,有了过去、有了历史,并不等于就拥有了未来,最后的成功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奋斗。

首先,我从几个简单的事例出发,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需要关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格局问题。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处于“冷战”格局当中。但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大格局,它仅仅是大的基本格局中的一个部分,历史上一个匆匆的过客而已。我所说的大格局,应该是较长历史时期内持续的一种状况,比如说古代文明世界中作为雏形的国际关系、秩序和格局,到了近代,又应该是近代的国际关系、秩序和格局,而“冷战”这四十年,就大的历史环境而言,它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

“冷战”结束的时候,我刚好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看到美国上上下下都有着一种共同的情绪和心态,你们可能会问:“上层和下层怎么可能会有同样的心态呢?难道说,焦大和林妹妹可能有一致的心态吗?不可能。”但事实上,某些时候,整个民族确实会被一种共同的心态所支配,而我恰恰看到了这种心态。那一年,也就是1991年的年末,戈尔巴乔夫黯然失色地告别了克里姆林宫,大家从电视上看到飘扬了七十多年的镰刀斧头旗降下来了,美国上上下下一片欢腾,除了那些非常激进的小部分美国人以外,上上下下气势昂扬,暗暗地松了口气:“终于我们战胜了,苏联垮台了!”

当时我去华盛顿,碰到了一位教授,他和中国的关系还不错,对中国也很了解,头脑还应该算比较清醒的。但是,他对我说:“我现在看不出,中国对于美国还有什么用处。‘冷战’时期美国‘打中国牌’是为了对付苏联,而现在苏联不存在了。”很清醒的学者呀,很渊博的教授啊,已经看不到中国的价值。一夜之间,我们的祖国,在很多美国知识分子以及学者心目当中,似乎失去了所有价值。也是在那一年,我在哈佛大学做了一个演讲,提问时间里,有的问题非常尖锐。比如有学者问我:“何教授,现在苏联垮台、东欧剧变,你认为对中国有没有影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直接反问他:“你是不是认为,下一个就要轮到中国啦?”他说:“是的,我们就是这样想的。”美利坚民族的人民确实很坦率、很公开、很开放,他们当时就是姿态高昂、居高临下地来看待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有责任有义务提醒他:“我们中国希望走自己的路,我们不会像苏联和东欧那样一夜剧变,我们需要也正在摸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希望你也沿着这条思路想一想。”

1993年,我在汉城做访问和研究,在那里结识了几位前苏联的朋友。有一位老大哥,瓦吉木教授,某天悄悄地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说是,他就邀请我参加晚上的一个party。我答应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七个俄罗斯的前共产党党员,一起喝着伏特加。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天是“十月革命”纪念日,他们在搞庆祝,但是现场气氛可以想象,异常低沉。一个Super Power(超级)的大国,不管它好不好、对不对,但它毕竟曾经Super过,她Super到现在不再Super啦。(笑)作为大国国民,这些前苏联党员和学者们的心态,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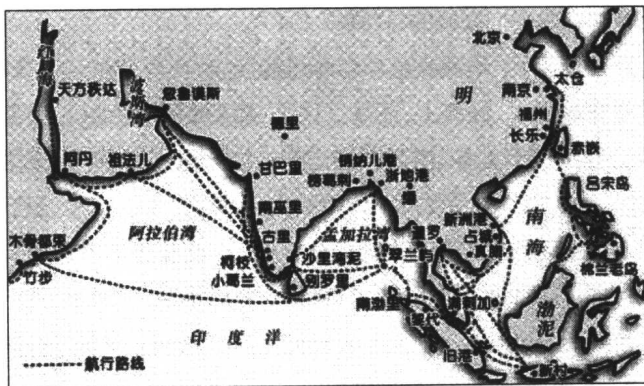


到很大的摧残。

这两件事情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时时警醒我: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大国的国民,自己的祖国在世界格局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它在世界棋盘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都与每个国民息息相关。因此,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确实需要关心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架构,以及咱们的祖国在此中的地位 and 作用。

我前面简单回顾了一百年以前、两百年以前和六百年以前我国在国际格局之中发生的某些历史性事件。这些时间不是随便挑的,因为我觉得,这三个时间和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正好处于两个不同的大格局。其一是古代的世界格局,另一是近代以来的格局。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的和平崛起》。关于“和平崛起”,存在不少意见相左的争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这样提,对别的国家来讲,是一种刺激,尤其会刺激那些“中国威胁论”的持有者。我个人不这样看。因为“崛起”或者“不崛起”,是客观的历史进程,“崛起”的基本性质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也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这些和刺激不刺激没有什么关系。“和平崛起”就是和平发展,二者是一回事。我们的“崛起”过程是在中央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是可持续的、科学的、和谐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理所当然是一种和平的发展。我们和古代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帝国不一样,我们和近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日本不一样,我们的和平发展就是和平崛起,我们的和平崛起也就是和平发展,我们怕什么“刺激别人”呢?(掌声)我在这里极端地讲一句:抗日战争中,南京大屠杀,我们三十多万同胞遭到残酷杀戮,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说“和平崛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说什么都没有意义,自己国家的大半领土包括首都被人家占据了,还谈什么“崛起”,谈什么和平发展?那三十万亡灵,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能跟日本兵说:“我想和平地喘气,我不刺激你,行不行?”可能吗?不行啊!只有现在,我们才有底气、才有能力发出“和平崛起”的声音。

紧接着,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两大时代的基本国际格局的走向。先讨论古代的国际格局走向。古代有没有世界格局?没有。因为在古代,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形成、文明的聚汇,还是在人口比较少、居住分散、文明规模比较小的背景下慢慢聚合与发展的,没有全世界统一的文明和国际格局,但是某些地区存在相对狭小的格局,比如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时期。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曾经致力于构建一个“朝贡”的国际体系,“朝贡”的格局,东亚的格局,我把它称为“华夷秩序”的格局。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格局,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确实是“惟我独尊”啊。所以,六百年前,当郑和率领他的两万七千八百多名部下出海远航的时候,那时的国际格局,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古代“华夷秩序”。郑和和他手下的几万名官兵,他们是处于世界文明之制高点的国民,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他们是处在主动的、积极的、高屋建瓴的态势之下。他们积极地传播中华的优秀文明,远航近三十年,走过三十多个国家,做过无数的交流,而这些交流都是和平的。打个也许



郑和航海图

郑和是举世闻名的伟大航海家。他从公元 1405 年到 1433 年的 28 年间,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 7 次远渡重洋,遍及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七下西洋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致力于同各国人民进行睦邻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敢于探险、不畏艰险、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也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与邻为善、世界大同、共享太平的社会意识。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今日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历史渊源。郑和下西洋的史实说明,在人类的历史上,并非只有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模式,还有一个追求平等互敬、和谐共享的东方模式。

不太恰当的比方,当时郑和的远洋船队就好像今天的“波音 747”飞机一样,经常迎来送往十几个国家的使团,有的使团来的一百五十人,有的三百四十人,有的五百四十人,有的第一千一百人。有一次,我跟一位美国朋友谈到:“我们的大明帝国迎来的使团啊,比你们的克林顿和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使团还要大。”

当时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周边格局下运作的。这样的世界周边格局，简单地说，有这样几大优点。第一点，当时处于这一格局中心的我们的老祖宗，首先强调的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当然，别的国家也不可能干涉中华帝国的内政，因为中华帝国文明的规模太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则上来说，我们也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去侵犯人家。明太祖朱元璋，这个贫农的儿子，尽管他当了皇帝以后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是他在对外政策上，制定了一个“不征之国名单”，十几个国家永远不要去征伐，征伐徒劳无益。并且，他还告诫后世子孙，千万千万不要对外穷兵黩武。其子永乐大帝，即明成祖朱棣，在这方面仍然贯彻他父亲的思想的。他的曾孙，宣德皇帝朱瞻基，再次贯彻这样的思想。四代三帝（其中一个仅当了一年皇帝就去世了，即明成祖长子，明仁宗朱高炽），对这一原则一以贯之，在所有对外的国书当中都提到：“共享太平之福”，互不侵犯，互不动武。中国以前不大说“和平”，喜欢说“太平”，宋祖英唱歌唱的还是“享太平”，可见“太平”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笑声）也就是说，第



一条,作为世界中心的我们强调的是“共享太平”。

第二条,厚往薄来。中华民族是非常厚道的民族,在对外关系中真的不是很苛刻。与他国交往,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很宽厚,要得少,给得多。记得明成祖时期,由于朝拜的外国使节太多,赏赐和赠送的礼物太重,另外还要派郑和到三四十个国家去送礼,送完国王送大官,送完大官送僧侣……到处送,厚往薄来。最后,礼部不堪重负,拟了个清单,建议立个规矩,国王、王妃、王子、公主,如此按照等级的规矩一一送下来。明成祖看后,大笔一挥:“虽加厚不为过也。”(笑声)意思是说,礼物再加厚一些也不为过,我们是泱泱大国,不要在乎这一点。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到毛主席时期,都是算政治帐而不算经济帐的。但是,比起那些对外刻薄待人、坑蒙拐骗、去欺负别人的作法,毕竟要好得多。

第三,不“强凌弱,众暴寡”。在古代中国构建的这个周边格局中,周围各国的实力是不一样的,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强有弱,强弱势力也经常发生变化。这个时候,我国主张,大家不要互相欺负。比如越南北方一个国家,南方一个国家,北方的就要去欺负南方的,南方的哇哇叫,要告状,这时,南方这个一边受欺负,一边去欺负柬埔寨,吃亏的也哇哇叫。(笑声)当时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去欺负马来西亚南边的马六甲,马六甲也哇哇叫。大家都哇哇叫,到哪儿叫呢?到大明帝国的宫廷来告状。每到此时,明朝的皇帝都致信给入侵国,强调:“不得强凌弱,不得众暴寡,共享太平之福。”然后,有的入侵国就会派使节来谢罪、做检讨。这确实是有了一定效果的。那时,中国一直管到什么地方呢?一直管到印度次大陆,Bangladesh,就是现在的孟加拉。它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还送了一只长颈鹿给大明皇帝,在宫廷内外引起轰动。明朝人都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麒麟,所以他们是送“祥瑞”来了。当有邻国欺负孟加拉时,明朝马上派人去调解。即使大明帝国越过了他的巅峰时期,而进入万历年间,中国国势已经不很强大,但当日本的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半岛时,大明帝国仍毅然发兵,和现在朝鲜、韩国的人民一起把日本入侵者赶下大海。

所以,我认为,中国古代有很多好的东西,“和”是最基本的理念。中华民族酝酿出来的“和为贵”的理念,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不违农时。这种天人相和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国人的文化思维方式。需要提及的是,这一理念也有其弱点,因为它根植于大一统的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服从大一统,才可以“共享太平之福”。反之,谁不服从大一统,我们就会觉得自身被冒犯了,偶尔就会露出不好的一面来。正如我们对邻邦,比如朝鲜、韩国、越南、缅甸,由于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都犯过错误。举个例子,当我参观韩国独立纪念馆的时候,讲解员给我解说韩国历史。讲到中韩两国共同抗日时,他特别起劲,神采飞扬地说:“何教授你看,我们两国共同并肩抗日!”但讲到历史上另外的战争时,他突然掩饰道:“何教授,请往前



走吧。”(笑声)我问这是什么,他回答说:“这是我们在跟外国打仗。”我心里是明白的,于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欺负你们老祖宗来着。我们的老祖宗应该向你们老祖宗道歉啊。”任何民族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弱点,我们古代这一格局也是这个情况。

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时,中国正高屋建瓴地站在世界文明的尖端上,站在世界“华夷秩序”的尖端上,那时候的永乐大帝,那时候的郑和,那时候的官兵,可想而知,是多么地气宇轩昂、多么大气恢宏地对待自己的周边世界。这一情况到十九、二十世纪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伴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不断在更大范围内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制度逐渐走向全世界,全新的格局产生了,但乾隆皇帝和他的宠臣和珅等人却看不到这种变化。

后来,清军跟太平天国势力打仗时,和曾国藩齐名的一位大员胡林翼,带兵立马江边,他朝江面看去,可谓“百舸争流千帆竞发”,此时,却见一艘小火轮以迅猛的速度赶超其他船只。胡林翼回去后即忧心忡忡,重病不起,因为他深深感到:局面变了,中国那个居于主动地位的时代远去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更是认清了三千年来这一大变局。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古代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失灵了,新的、近代的国际关系格局登场了,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作为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士,他们在奋斗。虽然现在我们经常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做出诸多批评、诸多批判,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当时的洋务派以及后来的维新派,确实是那个时代里先进的中国人,是当时中华民族内部的前卫部队、主力军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开始了一个很大的试验——洋务运动。因为他们感觉到,要在新的近代格局,即条约体系,《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求得大清帝国的向前奔去,刻不容缓需要变革。当时,日本在变,中国在变,缅甸、泰国、伊朗、奥斯曼土耳其、埃及、突尼斯、马达加斯加也都在改革。但是,在这种变革的情势下,我们的思维模式能否随之变革过来呢?这是不容易的。在大难临头、辞旧换新之际,大家感觉好像一脚蹬空了,直往下掉。想想,在老的格局中,我们中国是中央,是积极者,是主动者,泱泱大国的我们,怀着居高临下、高屋建瓴的心态,面对着其他国家。现在我们却被完全边缘化了,受凌辱、被欺压。中国该怎么办?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北京条约》、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还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逼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这四大条约构成的条约体系,把我们从一个天朝大国打成了被边缘化的半殖民地。可想而知,这一格局变化,对我们的民族,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所有东方国家都在奋斗,却只有一个日本最终奋斗出去了。原因何在?当时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作为前卫人士,无论是资历、经验,还是才华、学识,都决不是等闲之辈,而真正算得上上之选。但是,由于历史、社会以及阶级条件的限制,他们都没能跳出这样一个圈子:沿着古代中华文明的思路往下走。古代的理念将他们禁锢得太深,使得他们无法



发现,自己所处的文明平台与入侵者的新文明平台根本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我们是古代文明中的最高水准,而呼啸而来的这个文明是近代的文明新兴气息,正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于是,他们以自身的智慧、才华、经验和见识,在那里做些小修小补、小打小闹的工作,做些器物文明、物质文明引进的实践,而对于更为本质性的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却视而不见。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打一仗,就吃一次败仗,签一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他经手签订的。《马关条约》签了之后,全国都骂他是卖国贼,他还是不死心啊,跑到欧洲去考察。英国人讽刺他说:中堂大人到了英国,船台、枪炮到处看,就是不看“吾英之善政”。李鸿章虽然也知道英国有个 Parliament(议会),也知道美国的总统跟中国的皇帝不一样。格兰特总统算是他的老朋友,他到美国的时候专门去拜祭格兰特的墓地,却发现这位总统的坟墓不过是在一个平常百姓的墓园里,远没有中国的皇陵那般雄壮,他虽然也有想法,却没有更深刻的触动和启发。因此,他改变不了那个格局中中国的被动局面,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而日本却赶上去了,原因何在?日本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民族。就我学历史的经验来看,日本在和中国的交往中,曾经四次利用中华民族做“人梯”的好机会一跃而上。在古代格局之中,中国在中心,处于主动形势,日本在边缘,但是,日本踩着中华民族的“人梯”飞跃两次。第一个层次是原始社会到早期阶级社会,日本借助传播过去的中华文明,迅速地摆脱了原始社会进入阶级国家,中国走了两千多年,才发生这一转变,而日本只用了短短的几百年时间。第二个阶段是在隋唐时期,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虚心地接受和学习当时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并巧妙地拿回去。此后,日本大上一个台阶,也发展成为成熟的文明国家。我们从秦始皇走到唐太宗,走了八百年,而类似的进程,日本只走了百十年。近代国际格局形成后,日本适应于这一潮流,又抓住机会迈上了新台阶。第三个台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积蓄力量,打败了我们中国,几乎摧毁了整个北洋水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我们赔款了两万万三千多万两白银。日本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建立所用的资金,都可谓是中华民族的民脂民膏。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当中,日本的经济,疯了似的飞速发展,尽管也有其他因素,但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两万万三千多万两白银。当时的格局下,英国和沙皇俄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为沙皇俄国向南伸展他的利剑,从阿富汗、伊朗、波斯等地,插向印度洋,插向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珠——印度,使英国感到莫大的威胁。他需要在东亚找一个盟友,共同抗击俄国。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英国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殖民者,他看上了中国。因为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推动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建立了近代陆军,七十年代建立了近代海军,当时中国的北洋舰队在西太平洋属于 No.1(第一),即使是美国都未见得能超过我们。美国从杰弗逊总统开始,一直不重视海军,直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争夺西太平洋的萨默亚群岛的时候,德国人还看不起



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没有海军,所以李中堂领头建立的北洋海军确实雄居榜首。也正因为如此,寇松看上了变革中的中国作为自己的 partner(伙伴),认为经过洋务运动的中国,有了海军、陆军,有了铁路、煤矿,可以作为盟友一起对抗沙皇俄国。不曾料到,仅仅甲午战争一仗,中国就被打败了。西方列强可是极其势利的,于是,英国立刻转向日本,与其结为盟友,日本第三次踩着中华民族的“人梯”上去了。尽管这一次他们已经在向中心迈进,而我们已经被边缘化了,但他们依然自觉地踩着我们的肩膀上去了。第四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美国力图将其打入万难复起的境地,让其永远不能与自身抗衡,毕竟,珍珠港事件是美国人的奇耻大辱啊。而当时的美国,也在考虑战后如何找一个同盟者来对付苏联,他们把目光再次投向了作为战后五强之一的中国,要把中国扶起来。但是后来,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他们再一次转向了日本,日本在极短的时间里再度崛起,怎么崛起的?两颗原子弹使日本民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是日本国民的不幸,这个就不多说了。另外,盟军在日本实行地毯式轰炸,战后日本一片废墟,到处是流浪的孤儿,几百万复员的士兵、伤兵,境况非常凄惨。直到1955年过年的时候,日本报纸才第一次提到:“今年过年,我们感到了年味。”那么这个年味又是怎么来的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志愿军赴朝作战,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整整打了三年。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我们付出的是几十万的生命,朝鲜人民军也牺牲相当惨烈。而日本呢,就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把大部分军用特需订单都交给了日本,日本所有的工厂都开工,所有的工人都上岗,昼夜加班,大发了一笔战争财,经济几乎是呼啸着发展起来的。朝鲜战争以后是越南战争,中国很多人又去抗美援朝了,我们又一次付出,而日本再一次得到了战争特需的大量订单,经济又一次发展,到日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他已经变得趾高气扬了。从我们的邻邦日本曾经四次利用中华文明的优点或悲惨处境,四次飞跃了四大平台的事实,我们可以得知,世界格局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秩序,永远处于动态可变过程当中。今天,已经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仍然和邻邦日本,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有一个大格局之下彼此之间的关系,我想:中华民族再笨、再傻,也不能重蹈覆辙了吧。如何在今后同日本的互动中达到双赢,在座各位就责无旁贷了。

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格局,仍是近代以来大格局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从1648年《威斯特发利亚(Westphalia)和约》开始,近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是从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体系发展而来的。作为东方人,作为中国人,我们记住了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因此,我们很容易对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体系予以否定,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以来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近代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当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作为一股先进的社会力量、一个革命的阶级,他们所提倡和构建的这个条约体系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它贯穿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



的形成过程中,它有别于中世纪时代的体系,它保障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所以说,在当时的欧洲,《威斯特发利亚和约》起到了上升的积极历史作用。只不过在伴随资产阶级走向全世界的时候,这个条约体系就变成了我们头上的殖民枷锁。这一体系中的这一理念,可以说在西方一直大行其道,直至今天,比如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都可以追溯至此。

那么,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格局,作为中国人来说,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理念呢?首先需要看清我们面对的是怎样一个现实。这就是“一超多强”。“一超”即超级大国——美国,而“多强”中包括欧盟、日本等,当然也包括中国。这种现状会持续多少年?我个人认为,短期之内不会改变,10年,20年,都改变不了。美国现在很高调,很张扬,明年、后年,他也不可能不高调、不张扬。那么中期呢,这一包含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的国际格局会发生变化吗?我觉得也看不出来。美国是不是已经越过巅峰,走向衰落了?以前,总认为,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而凭借我多次前往美国、接触与了解美国的经验来说,美国还没有向下滑落。如果说美国已经越过了他的巅峰阶段,那么他的滑落阶段也会是一个很长的时期,而且在这个滑落过程当中,还会有起伏。我曾在美国中西部走了走,发现那里大概还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没有被开发,火车在西部跑了一天一夜,都是荒原一片。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国家还有这么辽阔的地方没有挖掘,还有很多的资源,还有强大的力量,不是我们短期、中期就可以让他不单边主义、不霸权主义、不强权政治的,我们做不到。美国这几年的经济不太景气,但从2000年开始已经有所好转。一位专家说,美国前年有十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去年增长是百分之四,我们是百分之九,但我们的基数只有一万四千亿美元啊。也就是说,他们增长的是四千亿美元,而我们只有不到一千四百亿美元。日本也是类似的情况,我们要追上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那么,美利坚民族是不是病态了呢?我们确实看到他的很多问题,他病态的一面。但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个民族的生命力仍然非常强。我小时候受的教育说,美国兵是“少爷兵”,美国人一味搞个人主义。NO,不是这样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民族品质,都有支撑他自强不息、自尊自爱的民族精神。有一次,我在加州的时候,陪同事去看他女儿学校的大会操,绝对的军容严整,散发着强烈的美利坚民族自豪感。当时,三万名参加会操的美国中学生就坐在家长席的对面,突然天降大雨,但是,三万名中学生,个个纹丝不动,让我深深感悟到美国新一代的集体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我再看他们的评委,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们,在大雨中坚持评判。仅有的一把伞,不是给职位最高的官员,而是给最需要的人——那个登录分数的人,而那个资格最老的主席光着头在大雨中淋着。于是,我知道了,美利坚民族没有完,有这样的民族精神,有这样广阔的疆土,这么强大的实力,尽管他不是没有缺点,沿着《Westphalia 条约》体系走下来的他还会坚持着一些不好的做法:霸权主义、